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〇二期 ——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5f)

【书刊评论】	金秋的《文革中的林彪事件》	欧阳龙门
【研究报告】	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因	周全华
【学术争鸣】	当代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幽灵	郭建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书刊评论】

金秋的《文革中的林彪事件》

• 欧阳龙门 •

金秋所著的《权力的文化——文革中的林彪事件》一书，于1999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1〕，至今尚未见有中译本。

此书因其作者的独特而具有一定的独到之处，对于关注“林彪事件”的人们来说，值得一读。

首先，作者是吴法宪的女儿。吴法宪曾任第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以后又被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于1981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判刑后不久就被安置到济南保外就医，2004年去世。去世前留下的手稿，为此书大量引用。到目前为止，吴法宪的手稿尚未正式出版，所以此书引用的手稿内容应该是迄今最具权威的吴法宪的说法。拥有一些别人所不具有的材料，是此书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作者金秋于1989年至1995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学习，获得了历史学的博士学位。以后一直在美国的大学任教。这样的学历和经历使作者能够使用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来对“林彪事件”进行研究。这是此书的又一个特点。相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作者为“林彪

事件”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看问题的角度；相对于西方的研究者来说，作者又具有对“林彪事件”及其背景、甚至于对整个中国政治文化背景的更具体、更切身的体验。

尤其要注意的是：此书出版于1999年，至今已有7年了。此书所提出的与中共官方不同的说法，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而在7年前，此书的说法无疑有它的先见之处。

一、此书的要点和独特之处

在此书的第1章“引言”中，作者认为中共官方对林彪的指控并未能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 林彪为什么要搞所谓的“政变”？2) 林彪为何出逃？3) 林彪为何机毁人亡？

此书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从政治角度看，文革体现了神化般的领袖和处在体制化过程中的官僚政府之间的对立的结果。……从社会角度看，文革正如毛理解的那样，表达了对官僚体制本身的积怨。从文化角度看，文革是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和共产革命精神的冲突。从经济角度看，文革是一场实验，其目的在于创造一个以农民的平均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从而否定资本主义的、市场导向的经济。”

此书的第2章“毛泽东和文化革命的理论”简要地介绍了中共建国以后的历史，提到了“反右”及以后的大跃进、整肃彭德怀的庐山会议、大饥荒、七千人大会、四清等等，作为文革发生的背景。此书指出毛的“继续革命”理论是文革的理论基础。

此书认为毛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曾在党内一度处于劣势，但是毛只用了7个月的时间就夺回了主动权，其标志就是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第3章的标题为“中国的老年政治和文化革命”，此书在这一章的开头引用了西方的一些学者使用老年心理学对政治领袖人物作的一些行为分析，其中包括对毛泽东作的一些行为分析。虽然本书只是简要地介绍了一些有关的结果，但是为有这方面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些继续深入了解的线索。这一章总结了中共建国以后党内斗争的模式：1) 毛对某人开始不信任，2) 毛在党内各级干部中造舆论反对某人；3) 全党批评某人，某人检讨；4) 给某人定罪。

第4章“林彪和文化革命”介绍了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林彪与毛的历史关系，尤其谈到了文革前“学习解放军”的运动，并且认为这个运动是为文革作准备。

此书认为林彪是完全“被动”地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是被毛拉上文革的战车的。根据吴法宪的说法，林彪既不愿意参加决定全面发动文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也不愿意做那个唯一的副主席。

这一章简述了文革初期各级党政军机关受到的冲击，尤其生动、具体地描述了空军司令部和吴法宪本人受到的冲击。

这一章对“二月逆流”的介绍具有其独特之处：

1) 在通常人们知道的1967年1月19日的“大闹京西宾馆”之后，老帅们本来是要在2月11日周恩来主持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发难攻击中央文革的，周恩来察觉了这一点，匆匆地结束了会议，而使老帅们未能遂愿，于是才有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

2) 在1月19日的“大闹京西宾馆”中，徐向前是站在中央文革一边与叶剑英发生冲突的。到了2月16日，徐向前才和叶剑英、陈毅等人一起批评中央文革。

3) 毛反击“二月逆流”的时候康生积极地组织老师们身边的工作人员（秘书、警卫）、服务人员（厨师、司机）对老师及他们的家属进行批判。后来毛又表示对老师们只是“教育”一下的时候，是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出面为老师及家属们解脱的。

本书评认为，此书的叙述固然是事实，但却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在整个文革中林彪有其被动的一面，也有其主动的一面。例如，林彪于1967年3月2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就是对“二月逆流”的反击，是对文革的积极肯定。这篇讲话曾作为中央文件传达，此书完全不提这一点。在参考文献中也没有列出这篇讲话。

又例如，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林彪、吴法宪等人的积极主动表现，此书也完全没有提及。

第5章“权力集团之间的冲突”介绍了文革中著名的“五一三事件”、“杨、余、傅事件”、九大的政治报告、九届二中全会的“设国家主席”之争。这一章是此书最有特色的一章。

关于“杨、余、傅事件”中杨成武的下台，此书提供了目前为止最合乎逻辑的说法：在吴法宪和杨成武的对峙当中，林彪明确地作出了保吴而弃杨的决定，但是林彪和吴法宪并不想(?)也不可能(!)打到杨成武，最后还是毛对杨成武的命运作出决定。

中共官方宣传说杨成武是被动地接受了以他的名义发表“大树特树”的文章。此书则以吴法宪的手稿指出：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杨成武曾洋洋自得地对吴法宪吹嘘这篇文章的巨大威力，罗瑞卿看了这篇文章立马就交待了自己从未正式入党的问题。

中共官方文件提出的林彪想做国家主席的一个关键证据是：叶群曾经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其出处是吴法宪的交代材料。

此书对这句话专门作了澄清：吴法宪在手稿中承认叶群并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自己是在“专案组”的高压下做了伪证。这个伪证之所以采用这种说法，是因为汪东兴对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程世清说过类似的话，程世清将此话转告吴法宪。吴法宪在高压下歪曲了事实，将此话说成是叶群对自己说的。吴法宪在手稿中承认：自己的交代材料中有多处的伪证，这只是其中之一。

第6章“中国政治中的家庭”首先介绍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特征，这对于西方的读者和中国的读者都有一定的意义。西方的读者因其文化背景，有可能并不很明了家庭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作用；而中国的读者则有可能身处其中而把一些特点认为是自然而普遍的。

接下来此书介绍了以江青和叶群为例的、中共革命中的夫人政治，但是应该而没有提到王光美也是类似的一例。

这一章谈到了林豆豆和林立果为例的“太子党”，介绍了林立果进入空军之后的的一些活动；讲述了吴法宪所说的“林立果可以指挥整个空军”的上下文；指出了林立果在空军的活动逐渐失控、以至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在背后到处讲吴法宪的坏话。

第7章“林彪事件”和第8章“结论：林彪的悲剧”简述了“九一三事件”的经过，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张宁的书(2)、林立衡的申述材料(未公布)、吴法宪的手稿(未公布)、以及

作者对张宁、林立衡的采访。针对官方的说法，此书的结论有：官方指控林彪“谋杀毛泽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都只不过是林立果等人的策划，并未付诸行动，林彪对此并不知情，黄、吴、李、邱等人更是一无所知；林彪准备以“被动”的方式面对毛泽东的清算，出逃完全是突发的，是林彪家庭成员各自的不协调的行为造成的。

二、此书的不足和错误之处

此书自然也有它的不足和错误之处。最大的不足在于此书只说了林彪、吴法宪在文革中的被动的一面，而没有说他们在文革中的主动的一面。事实上主动和被动两方面都有。例如本文第一部分中指出的林彪在反击“二月逆流”时的主动，林彪、吴法宪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的主动表现。

此书引述了吴法宪在文革初期受冲击、被整肃的一面，却没有描述他如何整别人的一面：例如，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的批斗陈再道的会上，吴法宪曾动手殴打陈再道（见〔3〕）。

事实上，像吴法宪这样的中共“老革命”，甚至毛泽东本人，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是少不了“整人”和“人整”的。

其次，此书介绍的权力集团的斗争，只有林、江集团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文革中权力集团的斗争还不止于这两个集团。而这两个集团也有他们合作的一方面，两个集团也曾有他们共同的敌人。这些此书都没有提到。

任何一本书，错误总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此书中的有些错误却是一个研究“林彪事件”的专家、一个中共高级将领的后代、一个与林彪的家庭有家庭来往的人，在一本专门研究“林彪事件”的、而且是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中所不应该犯的。现举例如下：

关于彭德怀在华北会议上因“百团大战”受到批判的事，此书将“华北”（North-China）错写成“华东”（East-China）：In 1945, at a meeting called the East-China Forum, Mao and his party comrades had criticized Peng for his direction of the controversial Hundred Regiments Campaign…（第50页）

在引用了戚本禹的批判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之后，此书写道：In May, Hongqi published an article by Qi Benyu, …… openly accusing Liu of being a “representative of imperialism, feudalism, and a reactionary bourgeois class”, “a false revolution” and a “Chinese Khrushchev”。（第59页）戚本禹的文章登载于1967年《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发行日期是1967年3月30日，《人民日报》4月1日转载。而不是此书说的“五月”。

此书提到长征时说长征是从“井冈山地区出发”的：In 1934, the CCP and the Red Army had to leave their revolutionary base in the Jinggang Mountain area and trek to northern China …… The trek later became known as the Long March.（第64页）此书的参考文献中列有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如果作者认真读过索尔兹伯里的书的话，就应该知道：红军自1929年撤出井冈山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见〔4〕第27页）。作者似乎也应该知道：吴法宪参加红军的时候（1930年），红军已经撤出井冈山地区；吴法宪参加了1934年开始的、从中央苏区出发的长征（见〔5〕第824页）。中央苏区不是、也不包括井冈山。

有关解放海南岛,此书是这样写的:…… on April 26,1950,the Fourth Field Army captured Hainan Island after an earlier futile effort by the Third Field Army that had cost 7,000 lives.(第69页)此书的说法很容易让人误解为:第三野战军进攻海南岛,损失了七千人而未能成功,然后第四野战军拿下了海南岛。事实上第三野战军损失了七千人而未能成功的是进攻金门岛,而不是海南岛。第四野战军吸取了第三野战军失败的教训,一举成功地拿下了海南岛。两者不是一回事。

此书说:…… on September 1966,Wan Xiaofang, party secretary of Tianjin, died after students kidnapped and abused him;(第90页)此处Wan Xiaofang”应该是“Wan Xiaotang”(万晓塘)之误。

说到毛泽东在文革中视察大江南北时,此书说:“In June 1967, Mao toured the South to check on the progres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第100页)事实上应该是“七月(July)”而不是“六月(June)”(见〔5〕第269页)

此书中两次提到江青在文革前长期负责“北京市政府的”文化艺术工作:The highest position she (Jiang Qing)had held until then (1966)was section chief in charge of artwork in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Beijing.(第144页)

Jiang Qing …had long been in charge of an office of cultural affairs in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第148页)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江青“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江青的简历中没有在“北京市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的纪录。(见〔4〕第267页)

此书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林立果是“清华大学”的学生: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an, he (Lin Ligu)was a student at Qinghua University.(第155页)“清华大学”应当是“北京大学”之误。(见〔5〕第378页)此书参考文献中列有王年一的书〔5〕,这个错误不应当出现。

此书谈到毛泽东为了“掺沙子”而将李德生放进军委办事组:Li Desheng, whom Mao transferred from the Shengyang region to Beijing to be a member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Working Group, …(第192页)此书颠倒了李德生任职沈阳和进入军委办事组的时间,事实上李德生进入军委办事组是在1969年4月,此前在安徽任职。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是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之后。(见〔4〕第320页)

注释:

〔1〕Jin Qiu,“The Culture of Power: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张宁.“尘劫” 香港明报出版社 1997

〔3〕陈再道.“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载“中国老年”1983年10月号

〔3〕Salisbury, Harrison E. “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5

〔4〕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  
【研究报告】

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因

• 周全华 •

一，神秘莫测的“继续革命”目标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明确而具体。但反修防修、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这场“革命”的消极目标。其积极目标是甚么呢？即这场“革命”要“立”甚么、实现甚么社会目标呢？毛泽东后来为“文革”的必要性辩护，说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只是一种事不成后的说法，是为他最初心高气盛的大目标打掩护的。因为巩固一个政权是无须革命的，清除、压制、镇压反革命属于专政范畴，不能称为革命。革命意味推翻旧政权或旧政治体制，建立新政权或新政治体制。

境内外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文革”只是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权力的归属才是毛泽东的真正目标。这不仅看低了毛泽东，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首先，看“文革”前的历史，刘少奇的权力从来没有超过毛泽东，毛泽东也从来没失去过权力。即使在大跃进失败后的低谷时期，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也不曾掌握主动权。当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导会议是显而易见的，他轻易就让全党认可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新的基本路线。其次，从此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领域的大规模批判运动，到“文革”的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策划（包括党内高层一系列人事清洗——彭、罗、陆、杨等），可看到刘少奇被撇在一边，被架空而无所作为。再次，“文革”开始后两个月多点，刘少奇就被免去中央副主席之职并停止本、兼一切工作，实际已经下台。从这三个阶段看，刘少奇难以构成权力斗争的一方。刘少奇失去权力后，“文革”运动才发展到冲击党政机关，第二年才全面夺权，这已经不是向刘少奇的夺权，他无权可夺。是如同当时所说的向“刘少奇代理人”夺权吗？非也，刘少奇不仅没有代理人，连个人关系稍微密切的当政者也没有。无论彭、罗、陆、杨，还是“刘、邓、陶”连语中的邓、陶，更不用说军中和各省的实力派，没有一人同刘少奇有特殊关系。之所以把这些人称为“刘少奇代理人”，只是给他们安上一个罪名，便于尽快打倒。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虚构一个并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论证“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刘少奇1966年下台，1969年去世，“文革”却足足批刘十年，显得过于重视，无形中夸大了刘少奇生前死后的势力。而这一切，其实是另有深层原因的，也即后面要论述的“文革”真正的目标流产，刘少奇就成为这流产目标的替代目标了。而今天一些研究者，把一个掩盖真正目标的替代目标，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是上当了。

还有一种权威的说法，认为“文革”的目标，即是文革前夕毛泽东发出的《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是毛泽东不满于斯大林官僚体制而勾勒的一种社会模式。以抗日各根据地仅实行于党政机关和军队的供给制军事共产主义为蓝本，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行各业办成限制社会分工，限制商品交换，亦劳亦学，亦文亦武，自给自足，平均分配，小而全、封闭式的“大学校”〔1〕。这种“大学校”模式，正如毛泽东所说：“已经不是甚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至于军队，已经做样做了几十年。”的确，自1958年以来，是不断向社会普及这种“大学校”模式的。毛泽东也明知这套模式不足以取代斯大林工业化模式，而只是对斯大林官僚体制的等级分化加以校正。这种“大学校”模式可以补充而不致于冲击斯大林体制，不会给社会带来混乱，全党无人反对，完全可以在不发动“文革”的条件下实施之，况

且已经早就在实施着。

那么，是甚么宏伟目标，促使毛泽东要发动这么一场“政治大革命”呢？不少同行已论述过，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过程中，认识上发生了一次飞跃，认为官僚主义已经由一种作风发展为一种体制，在中国已经形成“官僚特权阶层”。这个经济的“官僚阶层”，在政治上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由此酝酿出“继续革命”的命题。他要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按马克思说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但是对于他在这场“革命”过后所要建立的“崭新国家”是甚么样子，却未正面说过一个字。这也就是众多研究者对“文革”动因、“文革”目标，众说纷纭的一个原因。毛泽东为甚么神秘其事、天机莫测？当然，这恐怕也是他对付党内反对者的一种策略。但是，他始终缄口不言，即使在“一月革命”夺权的胜利时刻。其中隐情，恐怕只能作一些猜测了。笔者猜度，1958年大跃进轰轰烈烈公布的许多政治的目标，经济的指标，后来都没有实现，在国人面前和世界面前蒙受了耻辱，这给毛泽东留下了心理创伤。此后再不见毛泽东轻言具体社会目标，他信守“做到了再说”。“文革”的目标，可能也属此类。发动这么大一场运动，是不可能没有轰轰烈烈目标的。可是不说，这就难怪大批大批党的高级干部“紧跟不上”、“摸不透意图”、“很不理解”了。即连文革小组的一帮人，也没得到交底，他们也全靠揣摩毛泽东的意图行事。

## 二，“文革”目标刚浮出水面却突然隐去

但是，毛泽东的片言只语，还是透出了他心目中的宏图，只是当时人们和后来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罢了。早在1966年6月1日，毛泽东见到北京大学“导乱”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意味深长地称赞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张大字报只是攻击校级、市级领导压制运动，仅此而已，没有任何理论发挥。毛泽东却读出了——不如说是赋予了大字报作者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丰富内涵——中国即将发生的北京造反和造反中必将诞生的新政权“北京人民公社”，将具有十九世纪70年代巴黎公社起义及巴黎公社诞生一样的历史意义。其后，8月8日经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设置一种领导运动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小组或文化革命委员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这个权力机关的产生方式，不象过去领导运动的机构那样由上级委派，而是第一次打出了巴黎公社的旗帜：“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这又是一个重要信息。以产生巴黎公社的普选方式产生“文革”权力机构，这分明就是未来崭新的国家权力机构——“北京公社”及全国所有“公社”的雏型。

1967年“一月革命”展开全国全面大夺权。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新秩序”。这种语句，正是模仿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述。2月3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善于猜度毛泽东意图的陈伯达，在文中第一次给“文化大革命”的目标破题。社论说：“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新的形式”。社论说首先要“彻底打碎”旧官僚机构，“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接着，由群众组织负责人、驻军负责人和革命领导干部协商，建立临时权力机构。然后，“经过一个过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创建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地采取在群众运动中涌现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形式”。

同样善于揣摩毛泽东意图的张春桥，也认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是要重建一个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崭新的权力形式。当他2月初与陈伯达电商上海新政权名称时，从陈伯达口中获知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确证了他的猜度，便马上召集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把新政权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并于2月5日抢先宣告成立。这样，第一个“打

碎旧国家机器”的地方权力机关以“公社”的崭新名称出现了。但它暂时还没有实现巴黎公社原则。

《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说：目前由各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群众代表，与驻军负责人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的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要到以后才“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谁要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甚至压制群众，专断独行，就必须随时撤换清洗”。

应该说“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阐述的“崭新权力形式”的构想，是符合毛泽东反官僚主义、追求政治平等、恢复巴黎公社伟大理想的“文革”目标的。巴黎公社最得马克思激赏、最给毛泽东启示的，就是它的普选、直选、随时罢免的直接民主和公职低薪的平等主义，最彻底地反对官僚特权，最可靠地防止“公仆变主人”。激动60年代投入“文革”大民主的中国民众的心的，也正是毛泽东多次暗示过的巴黎公社直接民主和平等主义。“他们大多数似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公社的观念和理想依然抱着执着而真诚的信念，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的‘革命’行动正在影响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他们在作为社会的主人创造着历史。他们宁可忍受‘革命’的巨大代价和痛苦，也不想把自己心中的理想打碎。所以，在‘一切权力属于公社’的鼓噪声中，他们感到自己成了马克思曾经高度赞扬过的‘公社战士’，他们成了改变世界、创造历史的巴黎公社战士式的英雄”〔2〕。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宏伟目标，终于浮出了水面，他偶然透露胸怀而令人不知所云的“二十世纪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中国的巴黎公社）”，终于出现在东海之滨的最大工业城市——工人阶级集中的上海。

但是，毛泽东极端谨慎。1958年他兴高采烈然而未经深思熟虑地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结果人民公社在全国遍地开花，出了向共产主义冒进的大失误。他事后抱怨记者把他偶然说的一句话“捅出去了”。当时如果不说此话，就会主动得多。这一次，他没有表态，更谈不上像“一月革命”夺权那样发去贺电，也不让人民日报登消息。他还要观望一段时间。顿时，上海流言四起。“毛主席不同意叫人民公社”，“‘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的口号是错误的”，“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的，是张春桥搞的”。……“文革”的宏伟目标才露出水面，又隐去了，重又归于神秘。难道，巴黎公社不能在中国的贫瘠土地落户？巴黎公社只是一个遥远的梦？的确，直接民主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确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

### 三，从巴黎公社目标的悄悄撤退〔3〕

“一月革命”全面夺权的形势之严峻，只有毛泽东最为忧虑，这是关系“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如果夺权只是由一帮新人去取代旧人，那就不是革命，那是用罢官免官和选官任官的合法任免程式就可达到的。革命是“打碎旧官僚机器，建立崭新的政权形式。”如果不搞马克思赞扬过的巴黎公社，夺权后的国家机器就仍是旧的，这就势必否定了这场“革命”。但是在这么激烈的决战时刻，根本不具备巴黎公社直选的条件。现在已经天下大乱，如果再在乱中搞一个巴黎公社式的浪漫选举，那是乱上加乱，将导致国家的崩溃。毛泽东从六月的热切坠入一月的冷峻，冷峻的理性压倒了热切的浪漫。“一月革命”的大混乱不能任其持续过久，现在急需秩序和权威而不是理想化的民主，远不到打出巴黎公社旗帜的时候。毛泽东盼望尽快建立各地的临时权力机关，止乱返治。

从1月22日到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前，中央认可了青岛市、山西省、贵州省和黑龙江省的地方新政权。青岛市的新政权名为“革命造反委员会”。山西省新政权的名字虽不见于



人民日报，但是它首先贡献了“三结合”的政权建设经验。黑龙江省的新政权名叫“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2月2日社论指导性地提出：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现在最需要的是马上可以顶用的临时权力机构，而不是符合他理想的巴黎公社。所以他对上海公社不发一言。不到时间就会公布战略目标，会干扰目前的战机。

“革命”的一月过去了，“复辟”的二月来临了。形势大好变成大糟。造反派无法“大联合”，军队、领导干部也无法同造反派“三结合”，各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再也建立不起来。已建立临时权力机构的几个省市，“大联合”又分裂了，造反派打开了内战。毛泽东不希望看到的乱后之乱出现了，而他所心仪的巴黎公社目标正在远离这一场“政治大革命”而去。也就在这“文革”大目标受挫而不敢公开的时节，一场反对“文革”的风暴，在高层会议上爆发了。

2月13日下午的怀仁堂会议上，叶剑英质问“文革”小组的人：“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甚么！”他指向陈伯达：“请你解释一下，甚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2月16日下午的会议，还没开会，就质问张春桥，又是一场更加激烈的斗争（4）。

毛泽东受到了来自秩序派的压力。另一方面他又受到极左造反派的压力。上海市委机关造反总部居然向国务院发通令，通令取消一切“长”字型大小，说“带长的历来骑在党和人民头上”。他不愿意“文革”就这样被否定了，他更不愿意半个世纪浴血奋战换来的政权遭受毁灭的风险。他要向两方同时开战。他只能选择实用的革命委员会，而悄悄从“文革”的最初目标撤退。1967年2月，毛泽东作出了最终、最艰难的政治妥协——放弃了巴黎公社模式。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场“政治大革命”失去了必要性、合理性、正当性。发动“文革”的目标流产，实质上就是宣告“文革”的失败。一般认为1971年9月林彪的叛逃宣告了“文革”的失败，其实1967年2月巴黎公社目标的放弃，“文革”就褪弃了理想主义的光环。后来的还持续了多年“革命”，只是收拾大民主大动乱的残局而已。

2月12日毛泽东召张春桥、姚文元去北京，正式对上海公社名称表态。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正式规定：一、各省建立权力机构要报中央批准。二、除上海另有指示外，各地政权组织不用“人民公社”名称。2月23日，公开宣布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公社只存在十八天。其实，按照巴黎公社选举原则来看，上海公社一天也没有存在过。但上海公社的《宣言》毕竟许诺过：群、军、干三方协商产生的临时权力机构，将来过渡到“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会。也就是说，名义的上海公社其将来必定是实质的上海公社。但是上海公社的名义也仅仅存在十八天，它没有将来，上海公社的实质已被放弃。由于毛泽东始终就不曾宣传过“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个伟大目标，所以也就没有人想到要追究：为甚么如此轰轰烈烈、史无前例、代价巨大的“文化大革命”，难以产出东方的巴黎公社？毛泽东只好回到苏维埃体制的老路。1958年他曾经向公社共产主义突破，结果还是回到苏维埃体制。这一次他向巴黎公社方向突破，仍然要返回苏维埃体制。教条式的向原典突破，将永远走不出苏维埃体制的宿命。这是“文化大革命”用十年浩劫的代价换来的启示。

毛泽东在“一月革命”胜利的高潮中，亲自于1月13日约会了刘少奇，表示了和解。在此前后还多次表示要把刘少奇选进九届中央委员会。可是遭受了“二月失败”之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大变了。3月底作出公开批判刘少奇的决定。刘少奇以前只是运动初期打击的物件之一，毛泽东早在1966年10月工作会议上就保过他。现在，重新被选定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足足批判十年之久。这不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出尔反尔。他与刘少奇的小小的

个人恩怨，应该在10月工作会议就了断了。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巴黎公社模式的放弃，使毛泽东失去了发动“文革”的目标和理由，他需要为“文革”再找一个目标和理由。难怪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文化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选定刘少奇来伪装“文革”的目标，是成本最小的战略退却，是最易于为中国老百姓所理解的说法，也是契合于中国政治文化的聪明回答。

毛泽东在向张春桥、姚文元解释为甚么要放弃“公社”的名义，讲了本来是完全不必要的一大篇理由。他其实是在向全国作非正式解释，以掩饰他从巴黎公社目标的撤退。其要点如下。

一、“公社”只是新政权名字，没有实质意义。实质不在名称、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比如列宁发明的苏维埃，资产阶级也可以用，现在的苏维埃就是资产阶级的。巴黎公社也同样，如果它存在到现在，也蜕化成资产阶级公社了。英国有国王，但它是资产阶级。柬埔寨是王国，比总统制的南越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字也可以被资产阶级所用。实质不在名字。所以不必改名字。（按：政权名称当然与政权实质无必然联系，但是政权形式与政权实质有很大关系。这儿放弃的并不是毛泽东所说的“公社”名字，而是“公社”形式即政体。而“公社”形式是与实质即巴黎公社原则相联系的）。

二、采用“公社”名字，涉及改变国家政体，改变国号，这就发生一个外国承认的问题。（按：主旨仍然是要放弃“公社”形式的政体，改变国号和外交问题，只是次要的技术性问题）。

三、公社与党的关系怎么摆？党是核心，公社不能代替党。（按：巴黎公社没有党，这确是一个问题。看来毛泽东对苏维埃体制的党政关系，并无新的构想，这里透露出回到旧体制的重要信息）。

四、结论：新政权不要叫公社，叫革命委员会好，因为《十六条》上就规定了设置“文化革命委员会”。（按：革命委员会的产生原则，是在“大联合”、“三结合”的基础上由上级批准，与过去的任命制没有区别，而与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就相差万里了。所以不是无实质意义的名字问题，而是有重大实质意义的政体形式问题。之所以选用“革命委员会”名字，是考虑到合法性问题，因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有此名字，以这样的方式来变动政体，就可以绕开合法会议的讨论批准程式，免去许多麻烦）。

五、上海人民喜欢“公社”这个名字，不改名可以保护人民的革命热情。但是中央不能承认，因为全国要学，就会涉及政体、国号、外交承认等问题。如不想改，就等一个时候，可以晚一点改。（按：毛泽东对上海的态度是爱护的。说明上海的激进是符合毛泽东初衷的。他要上海撤退，完全是劝导式的，也考虑到撤退可能招致“伤害人民的革命热情”）。

#### 四，到革命委员会的蜕变

毛泽东以上海公社改名、以刘少奇为批判目标，而悄悄完成了从原定“文革”目标的撤退，接下来他用了两倍半于“文革”大民主的时间来止乱返治、恢复秩序。从1966年6月大民主的发动，到1967年“一月革命”的全面大夺权，总计八个月。从1967年2月“反逆流”到“全面内战”，再到1968年9月1日“全国山河一片红”，总计二十个月。这二十个月的治乱之难在于：本欲结束“文革”而又不得不肯定“文革”，而肯定“文革”又难以结束“文革”。重建权威（革命委员会）的两大难题是“大联合”与“三结合”。“大联合”之难在于：肯定造反组织却又要取消造反组织。为了肯定“文革”就要肯定各造反组织，为了结束文革就要取消各派群众组织。各派群众组织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服从同时取消各组织的“大联合”，更不服从被人吞并的“大联合”，而希望是吞并别人的“大联合”，或同时保留各组织的“大凑合”。

最后是在中央权力高压之下，以隔离组织头头办班、“斗私”释“兵权”的方式，勉强完成了“大联合”（保留了群众组织的名义而停止了组织活动，或驯服了造反组织，将“民办”转为“官办”，如建立“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来取代各造反组织）。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毛泽东放弃直接民主的巴黎公社模式而设计的企图有别于“旧官僚体制”的“联合政府”。“三结合”权力的“新”，在于吸收了代表“文革”大民主的造反派代表，他们象征“新”权力的革命色彩、大民主色彩和“文革”的合法性、必要性。组织系统和革命法统未受“文革”损害的军队，代表秩序和权威，他们才代表权力的真正功能与价值。被解放的领导干部只是提供执政经验，不能有所作为，不敢“复辟”。“三结合”之难在于：代表秩序与革命老法统的军队，同代表动乱与“文革”新法统的造反派，难以扭在一起，两方是斗争多于调协。最后是军代表压倒了造反派，“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最终成为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半军事管制委员会。

这不是毛泽东的意愿，但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不足以恢复秩序，他只能疏远造反派而信赖军队的力量。从1967年3月15日起，中央陆续决定对广东、青海、安徽、内蒙古、四川、甘肃、湖南、江西、广西等省实行军事管制。1967年5月31日，决定将建立地级以上政权的审批大权，完全交给各大军区或省军区。军代表在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占支配性地位，造反派与领导干部成为陪衬。在全国二十九省、市、区革命委员会中，军代表任主任的计二十名，占69%。其余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也大都兼任军职。军代表任县级以上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的，计5193人。所占比例，据六省市统计，均89%。军代表带进大批军队干部担任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中共九大的近1500名代表，军人超过半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军队代表占45%。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军队代表占47.5%。各地恢复党委后，党委班子的构成基本同于革命委员会的构成，军代表比例高，担任主要职务。这些党、政主要领导仍兼军职，必须接受军队领导。这样就形成军队控制党、政的不正常现象。毛泽东必须再度解决“枪指挥党”的困境。

“文革”以大民主开始，以巴黎公社直接民主为目标，却以“军事专政”为结果，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社会的高度政治化，发展为政治的高度军事化，这是一个危险的政治后果。九大以后，毛泽东着手清除政治军事化的后果，林彪事件的引发充分暴露了这种危险性。

林彪事件以后，加快了清除政治军事化的步伐。1972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一、由地方党委对当地党、政、军、民实行一元化领导。二、省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同时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野战军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中，也必须接受驻地省、市、区党委领导。三、实行军管的地区或单位，党委建立后，军管撤销，军管人员返回部队。四、各级党委建立后，军队支左机构即行撤销。

“至此，革命委员会的历史使命实际上已告结束。因为，作为‘三结合’中居支配地位的政治力量——人民解放军已从革命委员会中撤离；作为‘文化大革命’重要合法依据的群众组织——所谓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已经为逐渐恢复的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共青团、工会和妇联等所取代；作为‘三结合’中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尽管有一些是在‘突击纳新’和‘突击提干’中提拔上来的代表并主要是维护‘文化大革命’利益的造反派头头，但随着老干部的东山再起，‘革命干部’中老干部占了绝对的优势。也就是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已成了老干部占支配地位的权力机构。”〔5〕随着党委的恢复，革命委员会的权力又转移到党委。党的一元化领导得到恢复和重建。

这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名存实亡了。“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就象1961年改

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即恢复合作社）后的“人民公社”一样，只剩一个空名。传统的党一元化领导及政府体制，全面恢复了。毛泽东没有摆脱、而是又一次回归到苏联模式。

“一个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用他那激动人心的革命理想和豪情，唤起了几亿中国人的真诚的革命精神，去向党和国家传统领导体制发起了毁灭性的冲击，去向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进行‘全面夺权’，运动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运动的结果，却是重新建立和恢复了曾经竭力予以摧毁的传统领导体制。”“由‘文化大革命’初期不惜一切代价打碎旧的政权机构和政治体制，而准备建立直接民主的宏伟理想和宏大实验，结果导致了全面失控全面内战的危险事态；为避免整个国家政治秩序的彻底崩溃，随即放弃了普选的公社模式的幻想而不惜一切代价成立军管性质的革命委员会，结果又先后导致了国家权力机构的军事化和党的领导机构的军事化的危险政治结果；为清除政治军事化的危险，最后又无可奈何地回复到了‘文化大革命’要极力打破的政治体制。至此，中国社会在历经了十多年惊天动地的‘革命’后，一切似乎转了一个怪圈，又回到了‘革命’前的起点上。这场殊惊世界的‘大民主’社会实验工程，最终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意义上的民主之果，不仅没有解决党和国家旧的领导体制中有碍实现人民民主的弊端，而且把这种弊端发展到了淋漓尽致的境地，而且走向了民主的反面。壮志未酬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也在这种无力回天的政治轮回中，度过了自己极其孤独、悲凉的英雄暮年”。

“毛泽东由‘文化大革命’前雄心勃勃的直接民主设想最后转向军事管制性质的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与1957年由全党整风运动最后转向反右派斗争的过程，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而最后所导致的反民主后果又都恰恰是最初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发动整风的中共想极力避免的。”〔6〕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没有突破苏联集权体制，因而“任何貌似惊天动地的社会变革都只能最终陷入传统体制的恶性循环……革命委员会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在打破了传统的政治体制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新型的政权组织形式，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方面来说，革命委员会都完全属于传统政治体制的范畴，都与传统政治体制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它像一个巨大的展示台，将我国政治体制及其体制中早已存在的种种痼疾，经过‘文化大革命’极端放大以后，赤裸裸地、淋漓尽致一应俱全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化大革命’后期革命委员会的衰落、消亡及传统政治体制的重新恢复，并不是证明了传统政治体制的胜利和其生命力的强大，相反，恰恰证明了传统政治体制已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其恶疾已发展到不进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或革命，便根本无法医治的严重关头”〔7〕。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考，一直想以主动人为的治乱循环、运动循环来跳出黄炎培所归纳的客观“周期率”的兴亡循环、历史循环。然而他没能超越历史，没能超越苏式体制。

#### 注释

1. 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党史研究》，1987年2期。
2. 张志明：《从民主新路到依法治国》，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页233—234。本文观点多处得益于此书。
3. 以下两节文字参阅了张志明：《从民主新路到依法治国》。
4. 关于“二月逆流”，《解放军报》1979年2月26日。
5. 同注2，页253—254。
6. 同注2，页254—255。
7. 同注2，页269。

~~~~~  
【学术争鸣】

当代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幽灵

• 郭 建 •

1976年秋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已将近三十年了。当时，文革作为灾难和悲剧是官方与民间的共识，80年代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主流就是对文革的批判反思。然而，1989年以后，这种批判反思中断了。从此，文革不仅逐渐被淡忘，而且被粉饰、被美化，以至于那个极权专制登峰造极的时代开始有了“民主”、“平等”之类的名声！

文革形象三十年的变迁是一个甚为广泛而又复杂的论题。在这里，我只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描述近期在文革评价问题上出现的混乱：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知识界，一种口誉文革的思潮逐渐形成，而且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然而，这种重新评价并非建立在对文革历史本身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其根据只不过是某些西方左派文化批评家对中国文革和世界60年代的看法。本文试图探讨当代西方文化理论中的文革情结及其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影响。因篇幅所限，我只能择要而论。

一、阿尔图塞：从多元决定论到文化决定论

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的重要理论家。“新马”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将原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界定为“生产”，与经济并驾齐驱。“新马”以文化批判为己任，强调文化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作用。看到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为甚么一些“新马”的理论家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有浓厚的兴趣。

讨论阿尔图塞与文革的关系，如同讨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一样，一般要从1956年谈起。阿尔图塞对赫鲁晓夫在那一年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十分不满，称他的报告为“人道主义的呓语”。在他看来，苏共右翼对斯大林的全面否定（right-wing destalinization）和随之而来的政治解冻，证明苏联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开始向资本主义倒退。斯大林的问题并不在于赫鲁晓夫所说的“搞个人崇拜”和“侵犯社会主义法规”，而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现代化”理论，着力于改造苏联的经济结构，发展生产，以至于当存在于“其他结构”（文化、政治、思想等）中的旧势力卷土重来时毫无准备。为从左翼立场清算斯大林问题（left-wing critique），阿尔图塞提出了“多元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他认为，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锁定在启蒙主义现代性的框架中，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已经证明经济决定论是错的。于是，他主张破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对称的构架，而代之以多种因素（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并存、各自独立的构架，其中任何一种因素在特定的条件下都可能成为“强势结构”，在社会变革中起决定作用（1），此即阿尔图塞为自己的“左翼批评”造就的理论依据，由此，他便可得出如下的结论：斯大林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相信唯生产力论，进而没有看到革命主要是在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结果，他忽视了阶级斗争，没有继续文化领域的革命，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活。

在国际共运转折的关头，阿尔图塞和毛泽东的思路显然不谋而合。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也是在1956年开始形成的。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搞自由化，正是苏共背叛国际共运、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开端。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苏联那样的情况，毛泽东在1956年以后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反右倾、60年代的中苏论战和社

教运动都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而且，文革的头号攻击目标刘少奇就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在阿尔图塞看来，中国的文革终于在实践上解决了他一直在理论上探索的问题，这足以使他全盘接受毛泽东的文化决定论。文革开始后不久，他便在《关于文化大革命》（“Sur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一文中写道：“思想意识形态可以是决定一切的战略要点。在那个岔路口上，何去何从将决定我们的前途。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前进或倒退）将取决于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胜负。”〔2〕到了70年代，文革仍在继续，阿尔图塞开始将中国革命视为“在历史实践中唯一存在的”对斯大林问题的“左翼批评”〔3〕，此时的阿尔图塞已堪称彻底的文革派，用艾略特（Gregory Elliott）的话说，阿尔图塞此时已将马克思主义“毛化”（Maoization of Marxism）了〔4〕，尽管毛泽东和阿尔图塞都以马克思主义者自诩，毛式的文革理论和阿式的后现代“新马”都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恐怕难免釜底抽薪之嫌。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和阿尔图塞在斯大林问题上做出了颇为相似的选择：他们并非不了解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恐怖和斯大林的残暴，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理念，他们都拒绝面对现实，阿尔图塞所说的“左翼批评”和毛泽东授意并参加编写的“九评”一样，实际上都在为斯大林辩护，同时把矛头指向讲了几句真话的赫鲁晓夫。毛泽东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也取同样态度，阿尔图塞对于中国文革的浩劫也是一样。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历史在不断地重复，某些西方左翼理论家以及中国学界亦步亦趋者在文革评价问题上的态度与当年毛泽东、阿尔图塞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如出一辙：如今对文革批评为虚、辩护为实的文章多半只在理论上兜圈子，全然回避文革十年中严酷的现实。如此看重自己的理念、信仰的人是很难面对事实的，在他们看来，任何人叙述事实都有选择性，而且任何叙述都只是对事实的阐释，反映的不过是叙述者自身的偏见而已。这种态度使得他们和从史实、事实出发研究文革的学者之间几乎没有对话的可能，在国外和在中国大陆都是如此。

二、杰姆逊：文革、世界六十年代与后现代

美国“新马”文化理论家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与阿尔图塞在政治经历上大约相差十年，属于两代人：阿尔图塞的立足点在50年代，他所关注的是斯大林问题对国际共运的影响，他看文革，也是着眼于国际共运的发展。杰姆逊的立足点则70年代，他所思考的是那个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各种相互关联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现象以及这些现象所显示的新的历史阶段：晚期资本主义或（在文化层面上讲）后现代；因此，杰姆逊观察和评价文浮跑角度是世70年代和后现代的角度。

杰姆逊基本上接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认为历史阶段的划分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但他的马克思主义已是经阿尔图塞和法兰克福学派重构的“新马”，其中也包括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影响！文化已被界定界定为“生产方式”。杰姆逊指出，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过去的生产方式只是失去了强势地位，但并未消失，而且，未来的生产方式已经在形成，在新、旧历史阶段交替时，有一个明显的过渡期，“在这一时期，各种并存的生产方式之间发生明显冲突，它们之间的矛盾占据了政治、社会、历史生活的中心”。杰姆逊受到文革的启发，把这一过渡期称作“文化革命”〔5〕。各种文化、社会矛盾激烈冲突的6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一个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从中期、或帝国主义时代向晚期、或跨国资本/全球化时代过渡的时期，一个世界“文化革命”的年代；在文化上，60年代标志着现代主义的终结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那个世界格局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缩影。杰姆逊写道：〔6〕

60年代……是一个普遍解放的时刻，一个全球性能量释放的时刻。毛泽东对此进程的形像描述最富于启示性。他喊道：“我国就像一粒原子……一旦原子核发生裂变，释放出的热能必将产生惊天动地的力量。”这一形象向人们展示了在古老的封建村庄结构分崩离析后，在文化革

命对这些结构所遗留的习惯作了快心的扫荡之后，一个真正的大众民主社会终于诞生的景观。然而，原子的裂变，分子能量的释放，或“物质能指”(material signifiers)的解放，本来就可以是骇人的奇观；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究竟还是在他自己发动的运动所产生的最终结果面前退缩了：在文化革命的决定性时刻，在上海公社诞生之际，他阻止了党的机构的瓦解，有效地扭转了整个集体实验的方向（这一逆转所产生的后果在今天看来是再明显不过了）。在西方也是如此：60年代伟大的剧变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强有力的恢复，使得各种国家机器压迫力量卷土重来。

此即杰姆逊对60年代的总结：他认为“解放”与“控制”的相互转化是60年代“唯一的发展进程”，并将中国的“集体实验”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殖，西方青年学生的反体制、反文化运动，各种处于边缘地位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对现代主义的冲击，以及当代语言符号(sign)系统的消解以至“使能指(signifier)从所指(signified)神话的制约下得到解脱”，通通称为“解放”现象。不仅如此，在西方国家的反体制、反文化、反战运动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为西方左派力量提供了“政治文化的典范”，因为它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且有一套系统的、着眼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变革的理论，有深远的世界意义。杰姆逊写道：“文化革命是对被压迫民族或缺乏革命意识的各劳动阶级的集体的再教育，作为一种战略，文化革命旨在打破已成为人类历史上所有受剥削的劳动阶级第二本能的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陈规旧习。”因此，在杰姆逊看来，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或称“毛主义”在“60年代所有的伟大的思想意识形态中是最丰富的”(7)。

要知道毛泽东是否真打算“瓦解”党的机构，读一读文革中最流行的、居“红宝书”之首的那条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就足够了，而且，在文革式的极权主义框架中，领袖即党，杰姆逊大概还没有听说过“乱党乱军”这个罪名。了解到这一点，文革的“逆转”又从何谈起呢？不过，杰姆逊以“能量释放”60年代写照，这在当时的中国还算贴切，只是不知会有多少中国人闻之变色，马上联想到“阴阳头”、“喷气式”、深夜的砸门声和红卫兵手中带铜头的皮带……

上面几段引文出自杰姆逊1984年发表的《六十年代阶段论》（“Periodizing the 60s”）。此时，中国文革的荒诞、恐怖在国外已不是甚么新闻，对一个关心中国的西方学者来说，想要了解文革的一些基本事实并不是件难事。但是，像二十多年前阿尔图塞对待斯大林问题一样，杰姆逊在理念与事实之间选择了前者，并谴责那些敢于面对历史、正视现实，敢于自我否定、讲老实话的人，说他们顺应70、80年代右倾的世界趋势。杰姆逊写道：“当前在全世界出现的宣传运动中，毛主义和中国文化革命的经验被斯大林化，文革已被重写为东方的又一个古拉格集中营。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旨在全面诋毁60年代。”(8)在与《六十年代阶段论》同年发表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一文中，杰姆逊曾以一个“新”字画龙点睛，热情地赞美文革：他认为“新中国未完成的社会实验在世界史上无与伦比”，在那里，“人作为集体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新的把握”，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客体世界”，而且，这个集体已经成为“新的历史主体”(9)。杰姆逊的这种看法，应该说到1991年仍未改变。那一年，杰姆逊专论后现代的长篇著作收入此文，并以其标题为书名。出版前，作者对此文作了数处修改，对文革的赞叹之词却只字未动。此时，杰姆逊对文革的看法已经对中国的一些年轻学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一点将在下面作更具体的讨论。

三、德利克：“两个文化革命”和“文革毛主义”

就西方哲学和文化批评理论中的文革情结来说，除阿尔图塞和杰姆逊之外，萨特（Jean Paul Sartre）、拉康（Jacques Lacan）、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及常为先锋理论刊物

《如此即彼》(Tel Quel) 撰稿、在 70 年代访问过中国的几位法国批评家也很值得研究。我跳过他们而选择德利克 (Arif Dirlik), 是因为下面两个原因。首先, 我上面提到的几位法国理论家对中国的实际了解都非常少, 恐怕连隔雾看花都谈不上, 而德利克则完全不同: 他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专家, 而且是中共党史专家, 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有深入研究。其次, 正是由于德利克既了解中国, 又熟知近期流行的各种文化批评理论, 他在当代中国知识界有相当的影响。

德利克看文革, 基本上是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文革, 在这里他采用的杰姆逊的文了一个标新立异的说法: “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一个文化革命是“资本主义文化革命”指杰姆逊所说的资本主义向其晚期过渡时期的特殊现象, 这场文化革命将文化变成了商品, 并使它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和可销性, 这就是所谓“后现代”文化。与此同时, 还发生了另一场文化革命, 即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资本主义文化革命不同, 文化生产再中国的文化革命中不是目的, 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即通过文化手段教育群众, “为新社会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以对抗新政权本身的官僚主义, 建立一个理想的社群, 所以中国的文化革命是真正的革命。然而, 由于资本主义已在全球范围内进入后现代, 产生“毛主义”的那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已经不复存在, 因此, 从今天的角度看, 中国的文革不过是上一个时代的“残喘”, 毛主义在文革期间衰败, 主要是因为时过境迁 (10)。

从另一个角度, 德利克看到的是中国革命史和世界共运史中的文革, 这实际上是毛泽东自己的角度, 德利克基本上是在用不同的语汇毛泽东的某些观点。尽管德利克对文革的评价与历史现实去之千里, 他对毛泽东文革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观察还是比文革后中共中央文件中的解释更接近毛泽东本人的看法。例如, 根据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中共中央有关文革评价的最重要、最权威的文件),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集体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并不包括指导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而毛泽东本人则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思想 (这就是为甚么在 1971 年林彪事件已经显示文革破产之后, 文革一直不能结束; 以后五年中所有的政治运动, 批林批孔评《水浒》影射周恩来也好, 明确批判邓小平也罢, 无一不是为捍卫文革成果, 防止“右倾翻案”)。德利克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本人的见解一致, 他把文革理论, 或称“文革毛主义”(德利克语), 看作毛泽东思想的精华, 认为毛泽东作为革命家, 其独到之处就在于他竭力阻止革命成功后难免出现的“非激进化”(deradicalization) 倾向, 以“政治挂帅”对抗经济主义 (即“现代化”理论), 以文化领域中的不断革命推动社会主义的进程, 防止在中国出现苏式社会主义的官僚体制。由于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启始于 1956 年 (对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和中共八大强调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都表示不满), 德利克便将 1956 年视为文革的真正起点, 此后二十年的中国即摆脱了“早期共产主义政治模式”、代表“新共产主义运动”的“文革社会主义”中国, 此后二十年的毛泽东思想也就是最激进的“文革毛主义”(11), 而“文革毛主义”正是毛泽东思想中超越马克思主义的那一部分, 不愧为“我们时代最革命的思想意识形态”(12)。

作为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专家, 德利克对文革的严酷现实是不可能不了解的, 尽管如此, 他一直坚持文革派的立场, 而且, 他对“文革毛主义”的高度评价实在离文革中流行的“顶峰论”相去不远。德利克对文革后中国官方和民间一致否定文革的反应与二十年前阿尔图塞对苏共二十大的态度颇为相似: “文革不断被抹黑”, 德利克写道, 是因为“政治风气右转”, “不独中国如此, 全球皆然”。“正因为出现这种历史被抹煞的情况, 所以有必要重新恢复文革的历史事件地位, 这不但是为了让我们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正视它, 也许更重要的是要恢复我们的批判自觉, 好让我们亦能以批判的态度正视那些因为抹掉革命历史而被束之高阁的现代问题”(13)。不难想像, 德利克所说的“批判”即阿尔图塞式的“左翼批评”, 也就是说, 名为批评, 实为辩护; 同时, 批评的真正目标不是文革, 而是那些被德利克称为“抹掉革命历史”的“右派”势力。

德利克在文革评价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在下面的一段引文中表现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段他在多处刊物上发表过的文字，包括《二十一世纪》（14）：

对文革真正具有批判性的评价，如今极为罕见。这种评价必须从两方面认识文革的历史真实性：第一，它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意义；第二，历史环境的变迁所造成的距离；也就是说，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文革已显得如此遥远，以至于只剩下恶行和压迫的记忆。为了批判地理解文革，没有必要抹去当代人对文革的记忆和理解。实际上，抹去这些记忆，也就无需批判地理解文革，无需批判地理解人们过去和现在对文革的思考了。要求文革受难者以批判的态度思考文革实在是强人所难，但这只是当代人要完全贬低文革记忆的部分原因。本来就有许多人在道德上或政治上谴责文革，近二十年来，有更多的人加入了这个行列，其中有当年参加文革、在思想上和罪行上都脱不了关系的中国人，也有对自己当年醉心文革颇为健忘的外国人，还有许多人将文革记忆庸俗化，用它来为美国市场制作畅销书。意识形态和消费式窥隐心态的奇异结合已经使人谈起文革来无需任何见识，更不用说富于批判性的见识了。

这实在是一段在逻辑上和语气上都很奇特，因而在政治心理学上很具启示性的文字。首先，若说“要理解一段历史，我们应当格外珍惜、重视当代人的记忆”，这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出自德利克笔下的“为了批判地理解文革，没有必要抹去当代人对文革的记忆”这几个字意思虽然没错，但说法却是违反常识的，不管文中“批判”（critical）一词用意着重于“批”（取批评态度）还是“判”（审视与明断）。它告诉读者：对于作者来说，当代人的记忆不仅不重要，而且有碍于“批判地理解文革”。其次，“要求文革受难者以批判的态度思考文革实在是强人所难”这句话同样会使许多人感到莫名其妙。仔细想来，作者预设的“批判思考”一定与文革受难者的亲身感受针锋相对。实际上，作者对文革结论已下，他所谓的“批判”并不是对文革的批判，而是对文革批判的批判。这种批判需要的是信念，而不是情感，如何能把受难者心中的屈辱记忆和身上的累累伤痕当回事呢？再说，“许多人在道德上或政治上谴责文革”，如果基于事实，难道不对吗？当年用皮带抽打过老师的红卫兵，或当年拿“红宝书”当《圣经》读的外国青年，敢于否定自己，真心从批判的角度思考文革，难道也不对吗？然而，作者讲话的语气告诉我们，他不同意前者的谴责，对后者的反思和自我否定更是不屑一顾。最后，把政治当作商业契机的人的确有，受冷战意识左右的人也不少，但尊重事实、严肃对待历史、有同情心的人更多，如果德利克认为这些人谈文革没有任何见识的话，恐怕问题正在于德利克本人在意识形态和历史现实之间选择了前者，而前者又恰恰是“文革毛主义”本身。

四、中国“新左派”与“后学”的文革观

文革后的中国大陆，如同斯大林身后的苏联，一度出现了政治解冻。80年代文革思潮受到清算，五四精神复苏，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反思文革的思想资源在文化界受到普遍重视。正因为对文革的认真反思，从一开始就与自由、民主的呼声一致，1989年官方以暴力压制民主，此后文革研究自然也就成了禁区。然而，就在这时，在学术界，一种反启蒙、强行割裂自由和民主、乃至推崇文革的势力开始形成，其灵感来自当代西方文化批评理论，自然包括其中的文革情结。以批判自由主义为其主要理论使命的“新左派”就是这股势力中的一支主要力量。正因其对自由主义的仇视，崇尚文革成了新左派话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革对人的思想、个性和政治自由的扼杀，以及一切针对个人的暴行和残忍，都在反自由主义的新左派话语中变成了合理的事情。

80年代末是新左派思潮的萌芽阶段。当时，大陆的一些青年学者到国外求学，接触到各种流行的理论，有的还师从于像杰姆逊、德利克这样的左派理论家。他们自然可以辨认出那些理论中的本土因素（比如毛泽东的文化理论），也一定碰到了其中的文革神话，他们中的某些人

最终在自己的生活经验、文革的历史记录与西方的文革神话之间选择了后者，以至于认为在文革这个问题上杰姆逊等左派理论家有局外人的明眼，而许多中国人却难以摆脱山中人的短见（德利克所说的“要求文革受难者以批判的态度思考文革实在是强人所难”就包括这个意思，不是吗？）它们在90年代以来发表的文章中，只要涉及文革，基本上是以神话重构历史，以理论取代现实。

例如，有论者尽力粉饰文革式的极权制度，主张在这个“革命传统”中探寻“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即不同于西方在启蒙传统基础上建立的议会民主制度）。然而，文化大革命毕竟是中国有史以来罕见的浩劫，在十年前，为文革涂脂抹粉的话还不好直说，这位作者只得或借用些西方文化批评的语汇在理论上兜圈子，讲甚么“文化霸权”和“重建”，或以历史比较为名，把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阿尔图塞、福柯等人的主张与文革理论并提，搞出一套“谱系学”，以英雄所见略同来抬高文革的身价（15）。还有论者将1949年以后包括文革在内的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相对照，称前三十年的中国社会是“激进的民主社会”，并把文革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据他的观察，“改革派官僚一直在密切注视和防范任何重提或挪用毛泽东有关大众民主和参与观念的企图”，同时，“所谓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对文革和大众民主的继续不断的批判以及他们对专家政治的默许更加强了官方的各种反民主措施”（16）。

这一类为文革辩护的文字多半内容空泛，或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然而，不具体还好，新左派的文革论一旦具体化便漏洞百出，令人啼笑皆非。比如，有人具体论述所谓文革的“合理因素”，并建议：“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定为定期的全国性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17）又有人说，文革时的“群众文艺”作为“革命遗产”在当代已有了“新形式”：当年“忠字舞”所显示的“集体的、狂欢节的气氛”已在当今的街头舞会和卡拉OK酒吧“重现”（18）。也许，这两段文字可作杰姆逊所说的当代“语言符号系统消解”的范例：“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和“忠字舞”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具体的、特定的、明确的“所指”，若不靠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把“能指”从“所指神话”的制约下“解放”出来，它们如何能指与原意截然相悖的观念呢？

不管是明确提出也好，还是拐弯抹角地暗示也罢，新左派企图以所谓文革式的“大众民主”向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和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民主体制挑战。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后学”（即移植到中国的西方后现代、后殖民文化批评）与新左派既是同盟，又有分歧；由于后学的思维基本上是解构式的，所以“后学的文革观”其实是一个悖论。在后学家看来，近二三百年来西方启蒙主义现代话语已经在全世界形成文化霸权，非西方民族的自我认同很难超越西方的阐释模式；比如说，中国人反思、批判文革，绝不可能摆脱“东方学”的阴影。在这种情况下，后学的使命之一就是有这样的反思和批判进行无情的解构，辨析其中西方强加给中国的文化编码（19）。一位后学理论家在评论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时就一再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学（包括很多以文革为背景、富于批判性的作品）都有强烈的“现代性”，都是以西方有关“个人主体”的神话和有关“人”的伟大叙事为基点来阐释中国，描绘中国文化如何在时间上滞后；这些作品显示了“80年代在‘启蒙’话语中沉溺的知识份子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造成了一个“自我他者化”的文化局面（20）。还有一位后学家在评论在大陆被禁的电影《蓝风筝》时写道：“都到1994年了”，田壮壮还在“强调70年代末期‘伤痕文学’所表现的政治迫害和恐惧这样的主题”，其结果不过是“复制西方文化想像中的‘中国形象’”（21）。在他们的评论中，后学理论家似乎在有意回避一个最朴素却又非常重要的、一般读者都会想到的常识性问题：写文革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文革的现实？这也正是新左派有意回避的问题。一位曾与德利克合作的华裔学者讲过这样一句话：“至少我们现在无法获得完全自主的一种价值认同，我们还在别人的解释框架里寻找资源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和日常现象。”（22）这话有道理，问题是：甚么解释框架？到底是在哪一种解释框架中，文革的悲惨现实竟成了“想像”？

后学在哲学和政治理念上与新左派虽有分歧，但因双方都与自由主义为敌，都把自由、民主、法治当成他们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对象，于是就有了新左和后学的联盟。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这样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文革时期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大批判”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有甚么不同呢？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批判自由主义和自由民主，甚至极右的反自由主义理论也可以成为思想资源。其实，极左和极右结盟，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当年毛泽东在同斯诺（Edgar Snow）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谈话中就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不喜欢“有欺骗性”的“社会民主党”和“修正主义”，他宁愿与右派、甚至“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携手，以便对付共同的敌人（23）。由于同样的原因，在近期大陆出现的“施米特（Carl Schmitt）热”中，某些持新左和后学立场的学者对这位仇视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第三帝国“桂冠法学家”刮目相看。据一位施米特研究者的观察，新左派特别重视的就是施米特抨击议会民主制的著作《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Die geistesgeschichtliche Lage des heutigen Parlamentarismus*）（24）。令人担心的是，由于施米特的某些思想与文革政治颇为相近，今天在中国推崇施米特，明天会发生甚么呢（25）？

五、文革批判与自由民主

中国的新左派在全盘接受杰姆逊以至于德利克式的西方当代文化批评理论，包括其中的本土因素（即文革理论及文革神话），并把它作为自由主义批判的理论资源捧回故土时，忽视了、或有意回避了文革批判在当中国的意义：正因为文革时代是一个反民主、反自由、极权统治登峰造极的时代，对文革的批判反思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和社会条件下总是和倡导自由民主、挑战当局的权威主义、呼吁政治改革有同一性的。

官方对文革的态度实际上最能从侧面反映文革批判与自由民主的一致性。虽然中共中央对文革作了全面否定的结论，但这一结论如邓小平所说，“宜粗不宜细”，细究起来，轻者有损党的威信，重者政权合法性会出现危机（26）。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即使在政治气候相对温和的80年代，还是会有不断的“春寒”，对文革的批评稍严厉一点（如仍属“伤痕文学”的电影《苦恋》），就会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或“精神污染”的帽子受到批判。1989年的枪声宣告了政治解冻的结束，从此文革研究在大陆也就成了禁区，观点尖锐的研究著作和翔实的文献资料只能在香港或国外发表。与此同时，政府鼓励人们“向前/钱看”，这一政策在经济上无疑是对文革的反动，但在政治上则难免有犬儒主义之嫌，使人不再向后看；也就是说，不再反思文革。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政府否定文革，新左派赶西方文化理论的新浪、拉起旧日文革的大旗批判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却未受到当局的任何限制；某些“阳光明媚”的文革记忆招摇过市，也可以畅通无阻，甚至走进某些官方新建的“红色旅游点”。然而，恰恰是那些尊重事实、主张认真研究、反思、批判文革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受到压制、甚至被监视。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当局并不希望人们记住文革的悲剧，更不希望人们认真反思那段历史，因为这样做意味着启蒙的开端和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的可能性，这当然不是新左派所说的民主。

注释

1. Louis Althusser,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trans. Grahame Lock (London: NLB, 1976): 78—99;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Verso, 1979), 89—128. 另参 Gregory Elliott, *Althusser: The Detour of Theory* (London: Verso, 1987): 15.

2. Louis Althusser, "Sur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Cahiers Marxistes — Lemnistes 14 (November/December 1966): 5—16.

3. Louis Althusser,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92。

4. Gregory Elliott, Althusser: The Detour of Theory, 273。

5.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95—98。

6. Fredric Jameson,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vol. 2: The Syntax of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207—208。

7. 同注6, 页178—208。

8. 同注6, 页188—89。

9.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July—August 1984): 53—92。另见1991年Duk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同名书第29页。

10. Arif Dirlik,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New Centennial Review 3, no. 2 (Summer 2003): 241—70。另参考德利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1996年10月号, 页4—15。

11. 同注10。另参考德利克:〈从历史角度看“文革”的政治意义〉,《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七期(1996年春季), 页21—48。

12.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Introduction: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Chinese Socialism", in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ed.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9), 3—26。

13. 德利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 页4—5。有关德利克所谓的文革批判, 参见Arif Dirlik, "Revolutionary Hegemony and the Language of Revolution: Chinese Socialism between Present and Future", in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ed.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9): 27—41。

14. 同注10。

15. 刘康:〈全球化“悖论”与现代性“歧途”〉,《读书》, 1995年7月号, 页98—105;〈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二十一世纪》, 1996年10月号, 页140—146; "Politics, Critical Paradigms: Reflection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Modern China 19 (January 1993): 13—40; "The Problematics of Mao and Althusser: Alternative Modernit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Rethinking

Marxism 8 (Fall 1995): 1—25; “Hegemon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Literary History 28 (Winter 1997): 69—86。

16. Xudong Zhang, “Nationalism, Mass Culture, and Intellectual Strategies in Post-Tiananmen China”, Social Text 16, issue 2 (Summer 1998): 109—140; 〈理论与实践: 文学如何呈现历史? ——王安忆、张旭东对话〉, 2004年6月21日, “世纪中国”(www. cc. org. cn)。

17. 崔之元: 〈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 《二十一世纪》, 1994年8月号, 页5—16; 〈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 《亚洲周刊》, 1996年5月26日。

18. Liu Kang,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the Mass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Boundary 2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a special issue coedited by Arif Dirlik and Zhang Xudong), vol. 24, no. 3 (Fall 1997): 99—122。

19. 参看拙作 “Resisting Moder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odernism”, Modern China 25, no. 3 (July 1999): 343—76; “Politics of Othering and the Postmoderniz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stcolonial Studies 2, no. 2 (July 1999): 213—29。

20. 张颐武: 〈新时期小说与“现代性”〉, 《文学评论》, 1995年第5期, 页34—41; 〈阐释“中国”的焦虑〉, 《二十一世纪》, 1995年4月号, 页128—35。

21. Chen Xiaoming, “The Mysterious Other: Postpolitics in Chinese Film”, Boundary 2, vol. 24, no. 3 (Fall 1997): 123—41。

22. 张旭东: 〈张旭东访谈——全球化图景下的中国认同〉, 《21世纪经济报导》, 2005年9月12日。

23. 毛泽东: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1973年2月17日), 载宋永毅主编: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2002)。

24. 刘小枫编选: 《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 三联书店, 2002), 页12. 参见张旭东: 〈施米特的挑战——读《议会民主制的危机》〉, 《开放时代》, 2005年第2期, 页126—38。

25. 仅以所谓“政治即划分敌友”这一说法为例, 施米特认为, 有了敌人, 才会有政治, 对此文革可为佐证。借用施米特的语汇, 我们可以说, 文革理论的基础就是毛泽东的敌情观念, 其表达方式多种多样, 例如, “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防止会导致“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资本主义复辟等等。文革初期毛泽东发动群众, 也完全依靠制造敌情: 从文艺界、教育界打开缺口, 然后直指中央。所谓“阶级斗争, 一抓就灵”, 在实践中就是以甄别(当时叫“挖”或“揪”)或批斗“阶级敌人”为手段不断地将群众调起来跟党走。文革中的所谓思想教育旨在使群众认清敌友、爱憎分明, 进而热爱党和领袖、仇恨阶级敌人, 而这显示“阶级觉悟”的仇恨正是文革惨无人道的血腥暴力的思想基础。如今回首文革, 当年所谓的阶级敌人几乎全是无辜的。然而, 若无阶级敌人, 文革政治从何谈起呢?

26. 廖盖隆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第三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页601。

□ 原载《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